

中央宣傳部叢書



和平建國與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23936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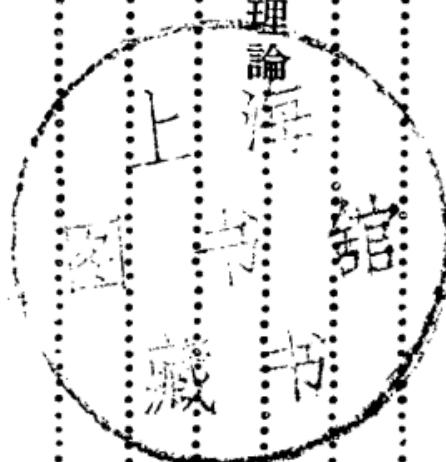
A541 212 0005 5857B

和平建國與國民黨

目 錄

引言

- 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
展開革命的和平反共復黨建國運動.....
和平建國偉業中國民黨的地位.....
戰由國民黨戰和由國民黨和其事實與理論.....
以黨治國與以黨建國.....
中國國民黨的責任及前途.....
中國國民黨的決心與行動.....
辛亥革命精神與今日的和平救國運動.....



- 周佛海
林柏生
曾寒冰
曾芝生
劉重道
中華日報社評
中華日報社評
中華日報社評

救黨救國應有的認識

中華日報社評

當前的急務復興中國國民黨

中華日報社評

發動護黨運動

中華日報社評

引 言

由於過去的革命史實，可以很深切的認識，中國國民黨，不僅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悠久歷史和力量強大黨員衆多的唯一大政黨，而且是挽救中國的超階級的民族性的政黨。國民黨的產生，完全是適合中國民族生存的需要，對外代表民族國家的利益，和造成民族國家地位的獨立平等；對內調和各階級的利益，和堅強全國民族的統一。所以縱使國民黨過去在政治方面，有功有罪，但決不能因過去的功罪，而否定國民黨的地位。

國民黨既是超階級的民族性的政黨，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來實踐建國救國的任務，那末爲國家民族獨立生存打算，應該抗戰的時候抗戰，應該和平的時候和平，方才是國民黨應擔負的正當任務。現在！事實擺在目前，國民黨應該把握時機，推進和平建國和平救國的偉大事業，這是國民黨必須擔負的最

高任務。

担负和平建國偉業的主體，應該是汪主席領導下的國民黨和政府。因為獨裁者所包辦的，共產黨所劫持的，黨和政府，已經失却國民黨和政府的價值與地位。

和平建國的偉業，既然應該以國民黨為中心，所以國民黨的責任，非常重大。黨的責任，也就是黨員的責任。周佛海先生說：「中國國民黨應該罪已，但是決不能放棄立場。」又說：「我們決不敢自驕與自滿，但是我們却要自信和自負。自信，就是相信我們的主義，可以建國，可以救國；自負，就是相信我們的黨，可以担负這個建國救國的責任。」看這幾句說話，便可以知道國民黨黨員，在和平建國偉業的演進中，應該堅守立場，堅信三民主義的遺教，將國民黨從共產黨包圍中拯救出來，不辭艱難的担负建國救國的責任。換句話說：便是在汪主席領導之下，中國國民黨員應共同起來，担负這和平建國的艱巨責任。

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

周佛海

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如何，今後的責任怎樣？這個問題，不僅是每個黨員應該有澈底的了解，就是每個國民，都應該有正確的認識。

關於第一點，有兩種極端的議論。第一種議論，以爲自從十七年北伐完成以後，國民黨的所作所爲，都是禍國殃民的勾當，簡直無一是處。第二種議論，則正相反對，以爲國民黨的行爲，沒有壞處，批評國民黨的，無論是好意或惡意，無論是期望或責難，都是反動。失勢失意的軍人政客以及對國民黨抱有成見和偏見的黨外人士，屬於前者。黨內一部份幼稚，淺薄，和狹隘的下級同志，則屬於後者。

我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我並不是沒有認錯的雅量，但是對於第一種議

論，却不能全部苟同，而要提出抗議的。攻擊國民黨的議論，我也聽見得很多，但是都是零零碎碎，枝枝節節的議論，沒有一一說明的可能和價值。不過，除却別有用心，捏造事實的以外，大約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點便是說國民黨不應該一黨專政。第二點便是說這次不應該輕啓戰端。

一黨專政這個名詞，據我所知道的，本來不是國民黨所創用的。因為國民黨最初就沒有以一黨永久包辦政治的用意。自從民國十三年容共以後，共產黨把蘇俄一黨專制的制度介紹到中國，然後纔產生這個名詞。國民黨的辦法，是把建國的程序，分做軍政，訓政，和憲政的三個時期。在軍政時期，當然彷彿是一黨專政。但是無論那一國，凡在革命的時期，豈祇是以黨專政，簡直是要以軍專政。我們只要讀過各國革命史，就可明白。所以無論就理論或事實說，軍政時期，在完成革命的必要上，是無可避免的。（反對革命的人，當然為另一問題。）至於訓政時期，看起來似乎是不許人民參預政治，其實何嘗是如此？建國大綱第八條，「在訓政時期，政府派員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人

民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人民能選舉縣官和議員，令他們執行行政和議立法律，可以說是不許人民預聞政治嗎？建國大綱第十四條，「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所以根據建國大綱的規定，在訓政時期，人民不僅可以參預地方政府，還可以參預中央政治。這可以說是一黨專政嗎？至於憲政時期，那更不待說了。所以說國民黨主張一黨專政，那便是誤解或曲解國民黨的主張。這是從理論上說明。我們再看一看國政府奠都南京以後的事實。民國十八年，就規定了訓政時期為六年，明白的規定了訓政時期是有期限的。以後雖然在內憂外患交逼之中，仍繼續着草擬憲法，選舉國民大會代表，並且定期召開國民大會。憲法草案制定了，代表的選舉，也十九完成了，不幸中日事變發生，不得不暫時中止。這些都是事實，勿容捏造。所以無論從理論方面或事實方面說明，國民黨決沒有主張一黨專政。固然，在訓政時期，國民黨是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但是這是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所授權的，是約法上

所規定的，不是沒有法律的根據。我們也不能因爲這點，就說國民黨是一黨專政，而且主張永久一黨專政。還有一部淺薄的人，以爲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黨外的人，沒有做官的可能。這尤其是抹煞事實的偏見。實際上民國十六年奠都南京以後，中央各院部的事務官，至少一半不是黨員，其中大部份是從北京政府來的。所以當時下層同志中，還有一句牢騷話，說是「軍事北伐，政治南征。」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說明北京政府，幾乎整個的搬到南京。至於各地方政府中非黨員的事務官，至少數目不在黨員之下。至於中央政務官中，也不是絕對沒有黨外人士。尤其是民國廿四年改組的行政院中，黨外人士所占的重要地位更不少。這些事實，都是說明國民黨並沒有排斥黨外人士，不許其參加政治。

然則訓政時期，一點流弊都沒有嗎？那却不然。一般下級黨部的幼稚黨員，誤解訓政爲一黨專政，常常利用黨的招牌，去爲非作歹：有些干涉地方行政，使地方官一籌莫展；有些包攬詞訟，把持教育，以肆其營私舞弊的陰謀；

有些排斥異己，侮辱鄉紳，以顯其作威作福的手段。他們所作所爲，比較他們所要打倒的土豪劣紳，還要壞幾十倍。這些地方，都足以授人以反對的口實，予人以攻擊的資料。黨外的一切反感，大都是從這方面發生的。所以談到黨部，便令人切齒，看見黨員，便令人側目。這些也都是事實，我們同志萬不可謾短，而不肯坦白的承認。不過我們一方面須承認這些事實，別方面也要認清另外一種現象；便是這些事實，自從民國二十一年以後，因爲中央嚴厲的糾正，便漸漸的減少，漸漸的納入正軌了，我們常常聽見下級黨員，發着黨權低落的牢騷，甚至號稱亡黨，便是這個現象的證明。如果只看見壞的一方面，而抹煞改進的現象，那未免太不公允了。

總而言之，國民黨只主張以黨訓政，而沒有主張一黨專政。至於訓政的前半期中所發生的流弊，全由於制度運用的沒有習慣，以及人的要素的沒有健全。這兩點，在後半期中，已經逐漸糾正，逐漸改良了。不僅不斷的改良不健全的現象，而且不斷的努力作黨政開始的準備。這能說國民黨把持政權，要永

久包辦政治嗎？我所說的，都是擺在面前的事實。我沒有絲毫護短之心，更沒有絲毫怙惡之念。不過如果以爲訓政便是國民黨的大罪極惡，那我便萬萬不能承認。

其次便是這次抗戰的責任問題，也就是功罪問題。我不覺得這次抗戰，完全是國民黨的罪惡。我現在雖然主和，但是我決不以爲過去的抗戰是無意義，無價值。如果稍爲有一點這樣的意思，那便對不起數十萬傷亡的忠勇將士和無數死傷流亡的同胞。我的判斷是：當時如果不抗戰，則國民黨無以對國民！現在如果不講和，國民黨也不足以對國民。換句話說：過去抗戰是功，不抗戰是罪；現在主和是功，不主和是罪。

何以說過去應該抗戰？我在「回憶與前瞻」一文中論着蘆溝橋事變當時的形勢，說兩方「都有不擴大之心，但都處於不得不擴大之勢」。我又說道：「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的時候一樣，毫無抵抗。因爲在北方如果不堅強的抵抗，既不足以表示我國的決心和實力，就不能戢當時一部日本軍人的氣燄。我

們要以實力表示我們是不可以不戰而屈，我們要以實力使日本知難而退。」九一八的時候，如果真正的抗戰起來，我想不單會因爲抗戰而擴大事件，反將因此而結束糾紛。否則與日本直接談判去覓求和平，也不致使事件越演變越離奇。當時既不戰，又不和。在不戰不和的糊糊塗塗的形勢之下，便把東四省輕輕的斷送了。這個責任，國民黨是沒有法子可以推卸的，這個罪名，國民黨也是沒有法子可以洗刷的。到了蘆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最好的辦法，當然是不擴大，當然是趕快了結。但是當時在華北一部分日本軍人，是何等氣餒，當時何嘗不努力以和平的方法來解決，但是終於失敗了。既然不能和，當然只好出之於戰。如果還踏着九一八當時的覆轍，在毫無抵抗的形勢下，又輕輕的斷送了華北，使日本收不戰而勝的效果，那國民黨更犯了天誅地滅的大罪了。這便是當時不得不抗戰的理由。此外，當時的抗戰，還有更積極，更偉大的意義和價值。那便是從這次抗戰中，打出了中日兩國的澈底覺悟，真正了解，和誠意的合作，把甲午以後的一切流水賬，告一個總清算。在過去，日本總以爲中國

是可以征服的，總以爲中國人民，還是像甲午當時一樣，拖着辮子的劣等民族。中國因爲在日本的威脅之下，當然無時無刻不準備打倒日本的侵略勢力。於是日本說中國排日，中國說日本侵華。互相爲因互相爲果，互相激蕩，互相磨擦，幾幾乎沒有一年沒有令兩國都感不快的糾紛事件。打不成相識，從這次痛打之中，中日兩國打成相識了。日本知道不能滅亡中國了。日本知道就是以軍隊占領了西康和甘肅，要和元清兩代一樣的統治中國，在現在是不可能了。日本也深知中國民族意識的堅強，民族精神的發揚，征服可是不容易了。

中國也知道要把日本的國力，消耗到不能和中國打仗的程度，也是不可能了。（另有用心的共產黨，和一知半解的高調者，當然是另外一種說法。）既然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中國也不能打倒日本，剩下的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便是扭着辮子打到底，打到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第二條路，便是兩方伸出大姆指，互稱三聲好漢，大家消釋仇恨，攜着手走上共存共榮的康莊大道。第一條是死路，第二條生路。到了現在，中日兩國，都覺悟着非走生路不可了。這個

覺悟，兩年前是沒有的。這便是抗戰的結果！所以過去數十萬將士和無數人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他們的碧血，灌溉了中日共存共榮的鮮花，他們實在是對得起民族，對得起國家了。因此，在國民黨訓政的時期，惹出這場滔天大禍，雖然不能說是國民黨的功，至少也不能說是國民黨的罪。因為從一時的仇殺中，得到了永久的澈底了解，從一時的犧牲中，奠定了百年和好的基礎，這個仇殺，是有意義的，這個犧牲，也是有價值的。我前面說：當時如果不抗戰，國民黨無以對國民，當時抗戰是功，不抗戰是罪，就是根據這些道理。

但是到了現在，情形就不同了。到了現在，如果還不講和，國民黨就無以對國民了。所以今後講和是功，不講和却是罪了。

戰與和都是手段，國家的生存與獨立，乃是目的。戰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就戰。和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就和。這個極普通的道理，誰都應該懂得。過去非戰不可，當然要不顧一切的戰；今後非和不可，當然也要不顧一切的和！爲甚麼今後不能再戰而要講和？因爲如果再戰，就要走上上面所說的第一條路，

就是死路。

我們要說明這個理由，最好先檢閱一下抗戰必勝論者所持的理由。我在「回憶與前瞻」一文中，曾經詳細說明，抗戰必勝論者所持的理由，是寄托在國際形勢變化和日本內部崩潰兩個鏡花水月的幻想中。我又詳細說明這個幻想，終於幻想。但是日本自從去年佔領了廣州武漢以後，已經十個月了。這十個月中，軍事上除了佔領南昌以外，只在沿海的地方，若斷若續的小規模的進攻。於是他們便以為日本沒有辦法了。日本既然不能大規模的進攻，又不能立即撤兵。把百萬大軍擺在中國，進既不能，退又不可，於是他們又斷定日本不得了。因為他們又把中國抗戰必勝的理由，寄託在日本的無辦法和日本的不得了的兩個根據上面。我現在不替日本辯護，說他們有辦法，說他們得了。但是他們無辦法，不一定就是我們有辦法；他們不得了，不一定就是我們得了。以他們的無辦法為我們的辦法，以他們的不得了為我們的得了，這不是欺人，直是自欺！打仗是相對的，是比較的。我們要從雙方比較的差額之中，去尋求勝負

決定因素，不能從單方絕對的現象，推斷戰爭的趨勢。日本固然不得了。如果他們的不得了只有九十九分，而我們的不得了却有一百分，我們就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了。他們固然無辦法，如果他們只要有了一分的辦法，而我們的辦法，只有一分，他們也就輸不到最後失敗了。一分的多少，可以決定最後的勝負，我們決不能單以人家的缺點，作我們的優點，不能單以人家的短處，爲我們的長處。日本的通貨膨脹，固然是他們的不得了。然而日本的通貨膨脹，決不能救濟我們法幣的慘落。日本在華百萬大軍的進退兩難，固然更是他們的不得了，然而他們的這個不得了，也不能抵銷我們壯丁徵募和武器供給的困難。

半年後才發生效力的美日商約廢止，也許是日本將來的不得了，（半年內另訂新約，當然是可能。）但是他們的程度，總不及我們全部海口被封鎖的不得了。最大的限度，也不過只是我們雖然無辦法，必使他們也無辦法；我們雖然不得不了，必使他們也不得了。換句話說，最大的限度，不過只能做到我們雖然死，務必使他們也同死。但是我們的目的，是在求生。人家能生，我們固然也

要生，就是人家必死，我們也要求生。一個國家，犯不着學青瘡潰皮，拿自己的死，去換別人的死。所以我們不能懷着兩敗俱傷的念頭。我們不能消極的以人家的無辦法爲我們的辦法，要積極的從人家的無辦法之中，去尋求我們的辦法，再進而爲人家也尋求辦法。我們不能被動的以人家的不得了爲我們的得了，要主動的從人家的不得了之中，設法使我們得了，更進而使人家也得了。

在現在中日兩國都在無辦法，都在不得了的時候，如果立即停戰講和，那末，中國有了辦法，日本也有了辦法；中國得了，日本也得了。中國既然不能在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本內部的崩潰之中，尋求最後的勝利，又不能因爲日本無辦法而有辦法，日本不得不了而得了，長此抗戰下去，不管人家亡不亡，人家死不死，我們自己是亡定了，是死定了。如果明明有生路却不去走，偏要走死路，國民黨還對得起人民嗎？近衛聲明和汪先生電所提議的和平條件，不是亡國的條件，我在「回憶與前瞻」中，已經詳細說明了。如果和平條件不足，以亡國，偏不接受和平；抗戰到底足以亡國，（最大的限度，日本也陪着崩

潰，但是中國總不免於亡。」偏要抗戰到底，國民黨難道可以說不負亡國的責任嗎？所以我說過去抗戰是國民黨的功，今後如果再不主張和平，便是國民黨犯下了死罪了。

以上是很客觀的從所謂一黨專政和此次抗戰的兩方面，估評國民黨過去的功過。所以我對於無保留的攻擊國民黨的議論，是絕對不服的。固然，黨員個人，當然有許多不正當，甚至於犯法的行為，但是一個黨員在百萬以上的革命黨，焉能保個個黨員都是好的。如果平心靜氣的想一想，當然不應以一部黨員個人的軌外行動，便歸罪於整個的，全體的黨。況且黨的中央，過去不斷的在檢閱，在監察，在糾正黨員幼稚或不正當的行為呢？

但是國民黨一點壞處都沒有嗎？那也不是事實。幼稚和狹隘的黨員，不許黨外的人說話，以為批評黨的便是反動，攻擊黨的便是大逆不道，這實在不是持平之論。一個革命政黨，一個革命黨員，做錯了事，應該有坦白自承的精神，應該有糾正錯誤的雅量和勇氣。封建時代的皇帝做錯了事，還要下罪己

詔，何況爲解放民衆而奮鬥的革命黨！

中國國民黨的罪惡，就是自從民國十六年以後，因爲黨的內部糾紛，而引起接二連三的內戰！共產黨的猖獗，是不斷的內戰產生的，外禍的緊迫，是不斷的內戰引起的。民國十六年受了共產黨挑撥的當，演成了寧漢分裂。以後便接着演成武漢方面，逼着蔣先生下野，李白又逼着唐生智走開。然而這兩次還沒有很激烈的戰事。等到十八年春天所謂「討桂」事件發生，比較上兩次，就多打了幾仗。以後在一年之中，接着發生了「討馮」之役和唐生智的「叛變」，在河南就打了多少次的血戰。到了十九年的中原大戰，無論在時間上或規模上，都是空前的內戰了。規模這樣大，時間這樣長的內戰，產生了兩個結果。第一，共產黨有了機會侵入長沙，有了機會在贛南蔓延發展，致演成到今天不但不能肅清，而且愈益猖獗的形勢。第二，因爲中原大戰的持久，雙方都不能下檯，於是請東北軍入關，以結束戰事。因爲東北最高當局的入關，於是又造成瀋陽事變的機會。又因爲瀋陽事變沒有毅然決然的方法去解決，只是一

味的拖，於是就拖出了這次中日兩國的空前的仇殺。國民革命軍，一共有四個集團軍，北伐還沒有完成，就發生了內戰的萌芽，北伐完成以後，便彼此互相砍殺起來了。假使北伐完成以後，大家不爭權力，不逞意氣，精誠團結，埋頭苦幹，共產黨那裏有發展而至於猖獗的機會？瀋陽事變，或其他類似的事情，那裏沒有避免的可能？內憂外患，從那裏來的？難道不是國民黨內部糾紛所產生的嗎？固然，在北伐完成以前，所謂直系，奉系，皖系，也不斷的演過走馬燈式的循環內戰。所以我們不能以內戰罪惡，單責諸國民黨。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爲過去各派各系，曾經不斷的演過內戰，遂減輕了國民黨內戰的罪惡。因此，國家弄到現在這個情形，大部分地方，被日本軍隊占領，剩下的地方，被共產黨所蹂躪，國民黨是萬萬不能推卸責任的！每個有良心，有勇氣的忠實同志，都要痛覺前非，努力自贖。我們再不能懷着以國殉黨，以黨殉人的心思，再不能採用這個辦法了。我們要倒轉過來，以人殉黨，以黨殉國。要有這種精神和毅力，黨才有救，國才有救。

以上所述，是完全根據事實，以客觀的態度，敍說國民黨過去的功罪。沒有含着一點私心，一點偏見。但是往事已矣！國民黨過去爲功爲罪，這篇糊塗賬，不必再去算，這段傷心史，也不必再去提了！鑒往可以知來，懲前足以毖後，我們且來檢討國民黨將來的地位罷。

中國國民黨今後的地位，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是法律的地位，一是政治的地位。不過在說明之前，我先要聲明一點，就是中國國民黨，應該罪己，但是決不能放棄立場。中國國民黨的罪己，是自己的良心問題和責任問題，決不是向任何方面討好，尤其不是向任何方面乞憐。同時中國國民黨的堅守立場，決不是排斥其他各黨各派，尤其不是想把持中國的政治，乃是表示我們的自信和自負。我們決不敢自驕和自滿，但是我們却要自信和自負。自信，就是相信我們的主義可以建國，可以救國；自負，就是相信我們的黨，可以担负這個建國救國的責任。如果沒有這個自信和自負，黨的存在，根本就要發生動搖，那裏還有團結各黨各派的資格呢？我們要虛心，但是我們要堅守立場。這

不是偏見，不是成見，更不是私心，乃是一個革命政黨賴以存在的最低的精神條件。我希望公平的讀者，先要了解這一點，然後再看下面的說明。

國民黨並沒有主張一黨專政，乃是主張以黨訓政。訓政，是有一定期限的。而且事實上，已經積極準備召開國民大會，以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的。這個道理和事實，上面已經說過了。所以中國國民黨現在和最近將來的法律上的地位，仍舊是負着訓政責任的黨，仍舊是根據約法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黨。固然，國民黨已經將國民大會準備完成了十分之九，預備開始憲政，把自己從訓政的地位，退到普通政黨的地位，並且把代行的政權，交回給人民。但是在國民大會沒有開會之前，他的地位和權力，仍舊是沒有變的。因為他的地位和權力，乃是約法所賦與的，已經變成了中國的法統，已經變成了中國的政治制度。這個法統和政治制度，只有國民大會才能變更。萬萬不能因為和日本打了仗，便被日本把法統打斷，把政治制度打破了。如果日本要征服中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為他既然要滅亡中國，當然隨便他要怎樣便怎樣。但是日本

再三聲明不是要滅亡中國，再三聲明尊重中國主權的獨立，而且聲明了和平條件的原則，預備和中國講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在召開國民大會的一種辦法之外，真找不出變更法統和政治制度的法律上的根據。固然有許多人對於現行的政治制度，表示不滿。但是制度的善惡，乃是價值判斷的問題，而我們現在所研究的，乃是國民黨法律上的地位的問題，儘管這個政治制度萬分不好，他既然是依法產生的，他既然是根據約法成立的，除掉根據合法的手續去變更以外，只有利用外力的壓迫或革命的手段來變更了。利用外力的壓迫，是不會有的。因為第一，日本既然再四聲明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當然不會毫無信義的壓迫中國變更法統和政治制度。第二，除却萬萬無可奈何，應着事實的需要，不得已而在某一局部產生維持地方秩序的組織以外，大約不會有人想利用外力的壓迫，來變更本國整個的法統和政治制度的。如果有這個心思，那便是亡國的思想。所以利用外力的壓迫來變更法統和制度，在普通人情和道理上，是不會有的。至於用革命的手段來變更，尤其是不可能。革命，是要有力量

的。在中國，我大膽的說，現在還找不出這樣有組織的力量。所以如果要變更中國國民黨的法律上的地位，只有繼續着戰前籌開國民大會的工作，迅速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的一種方法。在國民大會沒有開會之前，國民黨的法律上的地位，決沒有因為和日本打了一仗，便打得變更了。我相信只要是有法律思想而尊重法治的人，沒有理由可以反駁我這個理論。

在法律上，國民黨雖然仍舊站在訓政的地位，但是在政治的做法上，今後却萬萬不能不許其他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參預政治。國民黨固然應該自信能夠擔負救國建國的責任，而且準備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這個責任。但是却不應該以為其他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沒有擔負這個責任的能力，更不能蔑視他們擔負這個責任的義務和權利。國家的情形，危險到這個程度，合全國的人力財力，都不易挽回這個劫運，那裏還能夠再分散力量，再引起糾紛呢？遍地的潰兵散匪，怎樣處置？滿目的傷病流亡，怎樣撫輯？被毀的城市和鄉村，怎樣重建？被掘的江河堤防，怎樣修築？被破壞的交通及工商業，如

何恢復？快變成馬克，盧布的法幣，如何收拾？隨便的開出幾個題目，已經令我們沒有法子把文章做下去了。何況今後還不單是這些善後的問題呢！中日邦交如何調整？訂立的條約，如何使雙方都能切實的履行？都是要費極大的心思和努力的。中日的關係，不能以爲原則決定，條約成立，就算是已經調整。將來還有許多難關，要我們去打破，許多具體的困難問題，要我們去解決。這也不是一黨一派所能把持，所能包辦的。所以我相信中國國民黨沒有一個黨員，現在還主張不許黨外派系和人士，參加政治的。即使少數人有這種糊塗的主張，也不能得到黨的通過和採納，事實上，自從去年召集國民參政會以後，黨外派系和人士，已經參加實際政治了。今後除掉共產黨外，任何黨派，國民黨都願意和他們親密的合作，共同擔負這個艱巨的救國建國的責任。

剩下的一個問題，便是領導問題。國民黨一部份同志的意見，以爲和各黨各派合作，自然沒有問題。但是國民黨是站在領導的地位的。各黨各派，應該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擔負救國建國的責任。黨外人士的意見，剛剛相反。他

們以爲國民黨要領導他們，便是侮辱他們。這個恥辱，幾乎比亡國還要厲害。我聽見有人說，寧肯亡國，不願聽國民黨來領導。我以爲雙方的意見，都是錯的。領導，不在紙面，不在口頭，而在實力。如果有了實力，文字上就不寫領導，口頭上就不說領導，實際上是在領導着。假使沒有實力，就是天天喊着領導，時時寫着領導，實際上誰服從你的領導！所以大家都不要在表面上爭面子。國民黨的同志，不必在文字上，口頭上爭領導，應該實際上負着責任去做，以做成政治的重心。黨外人士，也不必怕聽領導兩個字，無論任何黨派，只要力量能夠領導中國的政治，中國國民黨是甘心情願的服從他的領導的。我們決不以爲領導是光榮，被領導是恥辱。所以今後中國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地位，完全看國民黨的力量如何而決定。

我們不願向任何方面討好和乞憐。但是在檢閱我們過去的功罪時，我們要自責。由自責而努力自贖。我們不願對任何方面排斥和反對，但是在考慮我們將來的地位時，我們要堅守立場。由堅守立場，而努力完成我們擔負的神聖使命。

命
。

六

展開革命的和平反共復黨建國運動

林柏生

我們號召全中國革命的愛國民衆，接受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相與奮起，展開革命的和平反共復黨建國運動。

大會宣言，根據 總理遺教，繼承第一次大會的精神，以完成二十七年臨時大會未竟之業，對於當前的急務，對於今後外交內政教育思想諸政策，剴切指明，授全黨同志以復黨建國之方針，示全國民衆以救亡圖存之途向，其意義至重且大。我們於此，有應明白認識者，三事：

第一，我們要明白認識，這一次的和平反共復黨建國運動是一種有組織的革命行動，是完成民族獨立運動的一個重要階段。有人說道，『抗戰是革命的，和平是妥協的，不革命的』；那不但不知道為什麼要抗戰？為什麼要和

平？並且不知道什麼是革命？要判別一種政治運動是否是革命的，不能只問形式上是激烈或是妥協，最要看的在它的實質，是否適應國民的需要，是否適應時代的發展。只要能夠適應國民的需要，適應時代的發展，則無論形式上是激烈或是妥協，都是革命的，反之，便是不革命，反革命的。就對內來說，國民革命，必先掃除障礙，則戰爭爲不可免，如果國民的需要，時代的發展到了必須統一而且可能統一的時候，則統一必求之於和平。所以 總理回粵，策動北伐，是革命的， 總理北上，推進統一，也是革命的。對內如此，對外何嘗不是一樣。在和平無可維持，不得已而應戰自衛，以保障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則戰爭是合乎革命需要的手段，及至戰爭無可繼續，必須以和平結束戰爭的任務，則革命的需要，便在和平，而不在戰爭。再進一步來說，一個國家，無論對內對外，沒有不以和平爲立國之大本的，戰爭不過是不得已而採行的手段，只有好亂成性的共產黨徒，纔會歪曲革命的真諦，內則煽動階級鬥爭，外則挑撥世界大戰，他們所進行的，不是社會革命，而是社會毀滅，他們所期望的，

不是世界和平，而是世界動亂。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為什麼中國不自由不平等呢？因爲中國是一個積弱的大國，因爲現代國家自由平等的條件還沒具備。革命的進行，必然是十二分艱苦的。爲具備現代國家自由平等所必需的條件，必須求得和平建設的環境，而爲保持和平建設的環境，爲掃除和平建設的障礙，有時不得不訴諸戰爭。和平與戰爭，形似矛盾，實則在民族獨立運動的最高目的上，是一貫的。戰爭是和平絕望以後之不得已的結果，也就是爲謀恢復和平之不得已的手段，而恢復和平則正是戰爭的目的，也就是建國的先決條件。去年臨全大會，提出『抗戰建國』的口號，並不是說，唯有無底的妄戰，纔能建國，而是一面指出在抗戰中，不要忘記了建國的任務，一面又指出抗戰只是手段，建國纔是目的。上次大會宣言鄭重聲明的『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當未到最後關頭，曾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從事於忍耐，既至最後關頭，則不得不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從事於犧牲。』這就是說，在

不得不戰的時候，革命者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奮起抗戰，到了可和的時候，革命者也必以同樣絕大之決心與勇氣，實現和平。此次大會宣言追溯上次大會宣言既定之和平方針，易『抗戰建國』之口號爲『和平建國』，非和平無以建國，非恢復和平以利建國大計之遂行則戰爭實爲無意義之尤，所以由『抗戰·建·國』以過渡於『和平·建·國』，目的是一貫的，精神是一貫的，革命的意義也是貫的。

自從汪先生發表^藍電之後，全國民衆，風起雲湧，致力和平，本黨同志，鑑於黨國危機，體認國民需要，與時代發展，乃有此次大會之舉行，本革命的精神，對於汪先生之和平建議，爲一致之接受，對於甘受共黨脅持之重慶當局之非法措置，爲一致之否決，重要革命的最高領導，從此和平建國，由主張而見諸行動，由黨員與民衆個別的行動而成普遍全國有組織有計劃的革命行動，這是復興本黨的第一步，也是和平建國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必須明白認識中國民族獨立運動自有其獨立發展的形態。在國

際帝國資本主義蛻變時間，列強一面積極準備戰爭，一面積極避免戰爭，其情勢較之戰前殖民地分割戰爭已進至另一高度的界石。準備戰爭的心事，使大戰的危機愈趨緊迫，而避免戰爭的心事，則使牽制戰爭的關係愈形複雜，由於這兩方面傾向之交錯，便形成了近年來殖民地半殖民地裏，因國際勢力之利害衝突而不斷的發生局部的戰爭，這不過是爲了避免目前的正面衝突，並且爲了準備後來的正面衝突，借殖民地來做前哨戰的戰場，非至最後，不訴之於直接的決戰。陣線論者每當一度國際危機便信口雌黃誑言大戰爆發，全不計及其時機，其範圍，及其性質，這是第一個錯誤。不但如此，他們日日鼓吹大戰爆發，以爲這樣，中國纔可以得救，全不計及把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獨立發展的可能，以再分割殖民地大戰之一部，只是毀滅了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獨立發展的可能，以國家民族做殖民地再分割戰爭的犧牲品，這是第二個錯誤。不但如此，他們並非站在中國的立場而抗戰，老老實實只是唯蘇俄之頤指氣使是從，蘇俄以甲爲友，要中國也以之爲友，蘇俄以乙爲敵，要中國也以之爲敵，他們所要保衛

的，是蘇俄，不是中國，這是第三個錯誤。我們於糾正陣線論者的錯誤之後，應該使世人知道，只有堅守着民族獨立運動發展的原則，纔能夠完成革命的使命，只有在自我努力的把握上，解決中日戰爭，纔不致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只有趕在二次大戰之前，解決中日戰爭，由中日兩國共同擔負復興東亞保障和平的責任，纔不致以東亞供帝國主義者再分割殖民地戰爭之犧牲。以目前的形勢，中日戰爭與二次大戰連在一起，於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於日本，也一樣的，有百害而無一利。

第三，我們必須明白認識，三民主義是中國革命的最高指導原理，現階段的民族獨立運動有三個支點，在民族主義方面，是反戰爭，在民權主義方面是反獨裁，在民生主義方面，是反共產。

爲什麼要反戰爭呢？當初以爲日本是要滅亡中國的，所以不得不奮起抗戰，如今知道日本不但沒有滅亡中國的心事，而且鄭重表示願與中國攜手以謀兩國之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由重建東亞和平進而維護世界和平，則在日本侵略

的意識已改變，即在中國，抗戰的對象已消失。戰禍的擴延，不過予國際擾亂勢力以可乘之隙，以遂行其擾亂東亞，侵略東亞的陰謀，所以我們今日必須反對侵略戰禍，重建和平。爲中國打算，應該如此，爲日本打算，也應該如此。我們不但要普及和平建國的宣傳，並且要擴大和平建國的行動，集中革命力量，掃蕩一切阻撓和平主張妄戰的惡勢力，這樣，纔能夠執行歷次大會明定之方針，實現和平，完成建國的大業。

爲什麼要反獨裁呢？大會宣言說『數年以來，黨已失去民主集權之制度精神，而日益趨於個人獨裁，此實爲一切敗壞之原因』。語其大要，因個人獨裁之變本加厲，而黨人離心，黨務渙散，賢能退避，宵小倖進，因個人獨裁之變本加厲，而黨與民衆，日益隔閡，民意沒由表現，民力沒由集中，所謂民意機關，不過獨裁者掩耳盜鈴之御用工具，因個人獨裁之變本加厲，而貪官污吏蠅營狗苟，裙帶姻姪，狼狽爲奸，其在平時，因無民衆之自發的參預與監督，所謂建設，非浪費大而成績微，即私囊飽而國庫空，其在戰時更陷於無組織之狀

態，貪污者上下其手，野心者爲所欲爲，窮苦民衆之鮮血爲戰事而流，正未有已，而獨裁者，貪污者復從而吸之，吮者，以供奉其一己之私慾，甚至關係國家存亡民族生死之和戰大計，亦無絲毫抉擇之自由，致成今日岌岌可危之頽狀。此次大會，由全體黨員之集體行動，謀黨務政治之澈底革新，發揮民主的精神，行使本黨最高權力，對於蔣中正同志之錯誤，予以糾正，對於總裁制度，予以廢止，對於政治之推動，授權主席，領導黨內同志黨外志士，共荷艱鉅，並決議儘速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從今日起，我們一反獨裁者之所爲，於黨恢復民主集權，於國樹立民主政治，復黨建國，舍此別無他途。

爲什麼要反共產呢？共產黨徒妄冀盜竊民生主義，以掩護其煽動階級鬥爭之陰謀。十三年以來，在本黨正確領導之下，民衆運動，有過偉大的發展，而未幾即漸歸於支離破碎，推原禍始，共產黨之背叛本黨，實爲厲之階。剿匪之役，糜爛者十有餘省，被難者數千百萬，推原禍始，共產黨之背叛革命，實爲厲之階。至於今日，戰禍擴延，和平受挫，無戰不敗，有土皆焦，社會經濟，

瀕於破產，國家元氣，摧殘殆盡，一般民衆生活日以窘，生產日以絕，推原禍始，亦皆因共產黨之脅持抗戰，爲階之厲，大會宣言，根據 總理遺教，對於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根本不同之精義，鄭重申明，對於共產黨徒假藉抗戰之陰謀及其罪惡，揭發無遺，並鄭重宣布，『以反共爲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和平所以順利建國之進行，反共則所以掃除建國之障礙。我們今後必須本此宣言，以根絕赤禍，實施民生主義之計劃經濟，培養武力，發達國力。

本黨總理孫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之國運在於國民之自決』。國事到了今天，存亡的關鍵，真可說是千鈞一髮。我們要挽回危迫的國運，只有自決，而此次大會宣言，實爲國人自決的惟一途徑。因此，我們大聲疾呼，我們要號召全中國革命的愛國民衆，接受大會宣言，相與奮起，展開革命的和平反共復黨建國運動！

和平建國偉業中國民黨的地位

曾寒冰

三年來的抗戰是國民黨領導，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事實，現在客觀條件需要和平，需要以和平建國，這運動中國民黨的地位又是怎樣呢？

我們已經指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超階級的民族性的政黨，中國的社會，還沒有發達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產生一個強有力的資產階級性的政黨來支持國運，同時工人階級也沒有成熟到可以產生一個強力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程度，客觀現實存在的國家民族條件，需要對外代表民族國家利益和求致民族國家地位獨立平等，對內能調和全民族國家利益和堅強內部統一的政黨，國民黨即是上述外部內部需要的條件之下的產物，她之所以成爲中國惟一大黨的緣故，亦即因此。

國民黨既然是超階級的民族性的政黨，代表著整個國家民族利益，所以在抗戰與和平的事業上，國民黨均以主導的姿態出現，現在抗戰離開和平不能收抗戰的善果，前此和平離開抗戰必將成爲屈辱的和平，國民黨站在民族國家利益的立場上，與在實踐建國運動的過程中來把握外部內部的有利條件來對於和平建國事業邁進，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同時也是國民黨所必須擔負的一種任務。

在抗戰期間，國民黨的地位是人所週知的事實，離開國民黨抗戰不能想像的這一事實，連共產黨也不能不加以承認。但現在的客觀環境需要和平建國，國民黨爲適應環境起見，曾在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裏修正黨綱，確定以後推進黨政的大計，在大會宣言裏曾明白宣稱開放黨禁，邀請各黨各派共同參加政府組織，集中黨外人才以策進和平建國事業。這以後，國民黨的地位有怎樣的變化呢？又國民黨的這種變化有不有黨的主義和總理遺教作根據呢？

國民黨在這次六全大會裏面，對於政府的組織，採取下列的兩種主張的。

是與過去是稍有不同的。

第一是廢除過去一黨專政的積習，使政府成爲各黨各派的領袖和有志之士的一個共同組織，集中力量收拾時局，再度鞏固國家基礎，確立近代的政治機構，宣言說：

『本屆大會特鄭重宣佈，授權汪同志，延請國內賢志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前此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其人選限於黨員，今當破除此例，以收集全中國人才之效，……本黨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負擔收拾時局之責任。』

根據黨的決議，今後中政會的組織，便在民主精神和人才主義的原則之下，成爲各黨各派的政治領袖共同結合，過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均限於黨員和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的關係，至此也有着變更了。

這有什麼黨的主義和總理遺教作依據呢？

本來在一個非常時期裏面，由各黨各派共同合作以解決國事，歐洲各國近

來是常見的事，總理生前主張和平統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時就是主張要由各黨各派各團體舉出代表出席國民會議共同商決，所以說；『我所主張和平統一的辦法，是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經有組織的團體舉出代表出席國民會議，大家商決國事。』（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的演講），這是總理當時用和平民主統一國內的辦法，現在在國家民族瀕於危亡之際，依據總理的這種精神主張由各黨各派組成中政會以共同負責解決國事，尤有其迫切的需要。

第二是作為中央最高政治指導機關的中央政治委員會既然由各黨各派來組織，國民黨是不是要喪失牠已取得的法律和政治的地位呢？不，決不。因為客觀的條件決定着一方面固然要由各黨各派來參加政府組織，但仍不能不是國民黨中心。這不是國民黨自己的爭取，而是由中國社會政治和歷史的條件決定的，第一是中國社會歷史的條件使國民黨肩負着歷史的使命，牠提倡民族主義，推翻君主專制，打倒封建的地方割據，向近代統一的國家邁進，同時推進民權和民生之建設，以充實近代國家的真實的內容，而對於二千多年來君主專

制下的中國完全是前進的革命的加以改造，因此國民黨事實上便成中國惟一歷史悠久和力量強大黨員衆多的大黨，任何國內的其他政黨都不能與牠比擬，第二是三民主義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的文化精神均相吻合，而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各種和平改造政策又恰合中國國家的需要，人民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之深入，任何黨不能和牠並論，第三是國民黨和由國民黨所建樹的國民政府已久為中國正統的唯一的有法律地位的黨和政府，這次為了恢復和平，用和平建國的途徑來拯救國家，必須由汪主席改組這個政府以為主體，因此和平建國的事業，雖然要由各黨各派以至於無黨無派的有志之士來參加，但事實上也非由國民黨領導不起來，所以以後的政治和實際的政治組織仍然是國民黨中心，這完全是一種客觀條件需要的事實，國民黨為着克盡其自身歷史的使命，也決不能逃避這種艱鉅的負擔。

在上述的一個政治轉換之下，國民黨有牠的地位，各黨各派也有牠的地位，這個轉換有幾點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一) 由於由各黨各派的合作，力量加強，意見集中，許多政治上的難關可以打破。可以收拾戰局。

(二) 由於仍然是國民黨中心，所以政治上仍然有一個主體，不致於陷入羣龍無首的狀態。

(三) 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來參加政府組織，牠所表現的意義可以說是符合於民主的精神。從此繼進，以建設民主政治的基礎，發展民主政治的組織。完全成爲一個健全的民治國家的目的，也可達到。

此外還有一個小的問題，即是：政府將組織一方面是由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來參加，另一方面是國民黨主體，但有什麼方法可以保證黨派之間不致發生裂痕呢？可以保證這樣的政府組織可以有健全的體制呢？關於這一問題，我們以爲是無足慮的，因爲就大的前提而論，有民族國家共同一致的利益存在，在民族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必要條件之下，黨派之間只有精誠合作才各有各的出路，各有各的發達，舍此一切無從談起，其次は國民黨是主張民主的，

對國事的意見，各黨各派均能經此方式以發揮其充分的主張，不致有所壅塞。有這些條件，我們是可以保證各黨各派可以合作，而由國民黨爲主體與各黨各派共同參加組織的政府，亦必可以成爲健全的政府。進而完成和平建國的大業。

這是各黨各派必須抱最大的決心用最大的努力來邁進的事業，國民黨尤其應該如此，能夠有這樣的決心和努力，和平建國偉業必然可成，各黨各派與國民黨都有其光輝的前途。舍此之外，黨派與國家民族都只有慘淡的命運，是不堪想像的。（轉載三民週刊）

由國民黨戰和由國民黨和之事實與理論

曾芝生

歷史是不會錯的，國民黨的產生，完全根據中國近代歷史的條件，她的發展，強大，並進而肩負着整個中國民族國家的命運以向前邁進，均係由中國歷史的條件決定着而並非偶然的事情。

中國國民黨的誕生，在海通以後中國已經向次殖民地轉化的時期，所以中國之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國民黨不負責任，而欲挽救這次殖民地的命運使成爲近代獨立平等的民族國家却正是她的任務。

次殖民地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是複雜的陳腐的，她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極

端險惡，而且到處都可以觸着侵略的魔手的。所以國民黨於此，對內要與舊的封建勢力鬥爭，要與無知的盲動勢力鬥爭，對外又要與侵略的各種勢力鬥爭，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之中，國民黨所遭受的艱辛和挫折，所犧牲的血肉與精神，是人所共睹的事實。自然，在這種困難艱苦的過程中，國民黨有時要犯着黨的路線的錯誤。黨員要犯着個人行動的錯誤，以致影響於社會民衆，也是難免的事實，我們站在黨的立場，承認錯誤并嚴格的加以糾正，同時站在黨的立場，熱望着全國民衆，了解次殖民地內部外部環境之險惡與國民黨所負任務之艱辛，加以廣大的支持與平心的寬恕。

國民黨執政以來，在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偉業上，已經有巨大的進步，統一的大業也漸次近於完成，但不幸中日戰爭的爆發，使國民黨在維護民族國家的獨立平等的任務上，不得不挺身作戰，因而建國偉業亦不得不半途遭受挫折，兩年以來的艱苦奮鬥，使民族力量得到儘量的發揮，使國際上對於中國民族不得不大加敬信，而尤其使敵方上下，亦不得不承認中國民族力量不可屈

伏，從而要與中國的新生勢力釋嫌言和，這固然是由於民衆的共同努力，但國民黨的堅強組織和指揮行動，是決定的作用，這種事業，決非國民黨以外的黨和勢力所能擔負。譬如共產黨是自稱爲抗日前衛并要爭取抗日的領導權的，但事實上對於偉大的國民黨的力量，不得不加承認，而對於自身，只能在承認國民黨力量的大前提之下，偷偷摸摸的紛飾，所以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報告裏，亦無可奈何地要作這樣的召供：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爲基礎的，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爲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國民黨有它的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先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所以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

抗戰離開國民黨不能想像。抗戰的責任，只有國民黨才能夠負荷，這完全
是現實客觀的事實，歷史的社會經濟的條件決定着國民黨爲中國唯一支持國運
的政黨，平時沒有一個黨可以與他抗衡，戰時也不能有一個新黨的產生可以代
替，所以國民黨已取得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始終是穩定而不能動搖的。又國
民黨之所以毅然領導抗戰^{（參見）}，是完全基於民族國家利益的，所以等到抗戰已有成
效，民族國家的利益可以不用戰爭來保障時，國民黨又以毅然決然的態度從事
和平運動。並且由和平的倡導進而至於具體的實踐和平救國的工作。在汪先生
的領導之下，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綱，確定對內對外的大
政方針，對內努力民主建設，以奠定民生的基礎，對外和平睦鄰，以保障國家
民族的平等獨立。這又是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之中，國民黨所擔負的一種現實任
務。這完全又是由歷史的條件和現實的環境所決定的。事實是這樣：中國既然
如前所說只有一個唯一的可以支持中國國運的政黨，在戰前和戰時沒有另一個
黨可以代替牠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所以日本要戰，便只能與國民黨戰，不與一個

國民黨戰，中日便沒有戰，要和，便只能與國民黨和，不與國民黨和，便只能找些毫無社會基礎的私人作傀儡而得不得和的成果，就中國本身而論，國民黨不領導抗戰，中國便只有亡，國民黨不領導議和，抗戰的結果便要流產。中國也只有漫無系列地趨向衰落。這樣，歷史的現實的客觀條件決定了國民黨的任務，國民黨在民族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權宜輕重之後，便都以勇敢的姿態挺身而出了。

二

一般人或者不免要疑心爲什麼像和戰這樣兩個關於國運存亡的大問題，在前後的時期內都要由國民黨來負擔呢？在這裏，我們要以嚴正的態度與社會科學的方法加以闡明⁽¹⁾，以消釋一班人之驚異，因驚異之消失，進而竭力支持國民黨的立場和行動，國家民族的利益乃可確保。

第一就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而論，至少在現階段不能有別的政黨可以在法

律上政治上取得確定的地位，進而支柱國運，近代的政黨，通常以代表階級的姿態出現，她所代表的階級的社會經濟勢力膨大，她便可進而以革命的或以漸進的手段，取得法律上政治上的地位。組織政府，對外維護國家利益，對內維護階級利益。歐美有力的政黨大都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以資產階級的基礎支持着黨，黨支柱着國家，革命後的俄國，是無產階級的一黨專政，以無產階級的基本支持着黨，黨支持着國家，（馬克斯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衝破國家的，斯太林倡導的是一國共產主義，對馬克斯主義是欺騙虛偽，但就客觀現實而論，牠是真實的，所以我說俄國共產黨仍是支持國家的。）但這種事實，在現階段的中國是不能存在的。現階段的中國，是次殖民地的國家。次殖民地國家的特徵，是外國金融資本工商業資本勢力的強大，國家沒有獨立的民族資本和民族工業的基礎，沒有獨立的民族資本家階級，從而也沒有充分的條件可以產生一個強有力的代表民族資本家階級的政黨。有的只是通過外國資本主義國家開設的洋行與其卵育下的行幫買辦階層，這個階層，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

工業商品與農業國家的原料交換之下的私生子，有損國家民族，而不能代表國家民族。即其自身，亦不能有堅定的基礎。所以中國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沒有發展出強大的民族資本家階級，從而也不能有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政黨可以支持國家的命運，這是中國與歐美不同的地方。至於說到無產階級，則更加沒有基礎。馬克斯主義的所謂無產階級是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農民不過居於附從的地位。資本主義社會事實上是工人無產階級的母胎，中國沒有民族工業沒有民族資本主義，這個嬰兒便難長成。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既沒有使無產階級生長成熟，並訓練到可以擔負歷史任務的程度，無產階級便沒有脫胎而出和獨力支柱國運的可能，中國共產黨雖然到處流徙，但實際在中國，牠是找不到馬克斯主義所說的社會基礎的。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并不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而是一種左傾的幼稚的盲動主義。中國共產黨的本身，也並不是如馬克斯所指出的產生於都市的工人無產階級基礎之上並代表著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因為這些條件和基礎，在資本主義沒有發達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是並沒有成熟

的。所以實際中國共產黨的形成，只是俄國共產黨組織和理論的皮毛與中國貧農階層的結合。共產黨的組織和理論，完全是外鎔的東西，並無真實的中國社會基礎作其依據，至於貧農階層的存在，秦漢以降，在中國社會史上是長期的存在着的。在天災流行兵變頻仍或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苛酷的剝削之下，是常被迫或被利用作無知的暴動的，西漢末的赤眉，黑山，白波，東漢末的黃巾，唐末的叛亂，明末的流寇，都是以窮農作基礎的，這不要思想政策只要在幾個簡單的口號之下或一件宗教的外衣之下就可以領導起來而給予社會以破壞的。

這完全是歷史的事實，西漢末的劉盆子，東漢末的張角，唐末的黃巢與王芝仙，明末的李自成與張獻忠，都可以領導。現階段中國共產黨所有的中國社會基礎，仍然是沿襲着上述中國歷史上的東西，而不是馬克斯所指出的近代共產主義的基礎。⁽⁴⁾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新的內容，只有外鎔的組織形態和盲動思想，除此便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了無二致。共產主義是必須建設在極高度的工業基礎之上的，歐美資本主義與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尚未實行共產主義，俄國

已行的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採用經濟政策，實行社會主義，所以共產黨之於中國，並無革命的作用，由於牠的盲動與破壞，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不得加速地走上工業化的道路，牠的本身倒是革命前途的障礙，這樣的黨，是決不能支持國運而肩負着和戰的大責的。所以事實上，中國社會經濟的客觀條件決定着只有中國國民黨才有這樣的力量，這完全是歷史的任務，無可逃避的現實事件。

三

在這裏，我們要問：為什麼只有國民黨可以擔負起這種責任？國民黨在什麼基礎之上產生這種力量而又必須擔負着這一歷史的任務呢？

如前所說，現階段的中國不能產生強有力的資產階級的政黨，同時更不能有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的現實的條件與客觀環境，需要一個對外能代表全民族國家利益，對內能調和全民族國家利益的政黨，國民黨就是在這樣內外需要的條件之下產生的政黨，牠的所以能夠發達強大並進而在法律上政治

上取得唯一的地位的緣故，實即因此。所以就國民黨的本質而論，完全是一個民族性的政黨。這事實純粹是由中國社會國家的基礎和條件決定着的。我們就下列的兩項來分析，更可證明次殖民地的國家必須有民族性的政黨，而一個政黨要在次殖民地成爲唯一強大的政黨也必須具有這種性質。

第一是次殖民地國家內部階級對立的形態不甚顯明，而且沒有一個階級具有特別的力量可以支持國家，如在二節所說的資產的政黨以至無產階級的政黨，都在中國不能取得主導的地位。便是事實。這完全是次殖民地的特殊的歷史的社會經濟的條件所範圍出來的特殊形態。事實上在農村方面，大體只有小地主與佃農貧農的差別，而在外國工業商品之侵略之下，遭受着同樣的命運。都市方面，大體也只有小工廠主與工人，店主與學徒的差別，大部大工廠的經營和資本，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操縱於外人之手，所以事實上中國的工人階級是直接和外國資本家階級對立，不但工人，如果不是買辦階級而是民族的小資產階級的話，牠的地位也是和外國資本家階級對立的，一方面由於產業的落後

與整個經濟發展的遲鈍，階級的分化沒有明顯，沒有在民族的內部尖銳的對立起來，另一方面，在對外需要抗禦外國資本主義侵襲的條件之下，各階級又需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之下，統一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國民黨是由各階級間的有用和知識份子的共同結合而產生的。牠由各階級產生，而不單獨代表各階級利益，次殖民地國家內部各階級的利益既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下統一着，國民黨便以挺立的雄姿，代表民族國家利益而從事奮鬥。提倡民族主義，對外要求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平等，對內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就次殖民地歷史的社會經濟的條件以及國民黨奮鬥的必然目標而論，無疑的，國民黨是民族性的政黨。

第二是次殖民地國家內部階級間的利益衝突沒有尖銳的對立。這是與上述階級沒有明顯對立的形態互為因果的。不但沒有尖銳的對立，而且就上述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而言利益，還是一致而且還需要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下統一起來，所以在民族國家內部縱有各階級間微弱的利害衝突，然而在民族國家利

益的大前提之下，在必須取得民族國家利益才有階級利益的次殖民地的現實客觀條件之下，各階級的本身不需要單獨有一個黨來爭取各自的利益，而需要一個代表民族國家利益的黨，由各階級的前進和知識份子產生，而又站在各階級之上以調和各階級的利益。因爲前者的結果，必然的要損害民族國家的利益，從而自身的階級利益亦不能獲得；而後者，則兩相益而不相礙。結果是調和民族國家利益。在這種客觀要求之下，國民黨又嚴正地以民族性的政黨出現了，她提倡民權主義，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使任何階級任何個人都有政治的工具可以維護他本身的利益；她提倡民生主義，用生理的和平的經濟政策，從事建設，調和各階級的利益，並企圖在生理的和平的建設過程中，有計劃的消滅各種階級間利益所以衝突的因素，並進而消滅階級。所以在現階段，階級利益是由次殖民地客觀條件的規定在民族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下矛盾地統一起來（這矛盾如以前所論是極微弱的），但到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建設完成之後，階級的利益沒有存在，連階級的本身也不存在，這時便只有民族國家的大融合了。所

以就次殖民地內部階級間利益沒有尖銳的對立，客觀環境需要階級利益調和，不需要階級利益衝突，各階級不需要各有黨也不能各有黨來相互鬥爭的諸種事實來考察，就知道只有國民黨才是中國歷史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所規定的黨，只有具有民族性的國民黨，才可是擔負着這個歷史的任務。

所以，就各方面的條件來考察，無疑的，本質上，國民黨是一個民族政黨。

四

因為國民黨的本質是如此，而客觀的中國民族國家的外部內部的條件又決定着國民黨的歷史任務，使其不得不艱苦邁進。所以國民黨之成爲中國唯一大黨而必須全力支持着國運，並不是偶然的，是國民黨必然的命運，同時也是中國國家民族必然的命運。無可推委，現在當前的一個問題，是和戰問題，我們知道了國民黨的本質與中國外部內部的客觀事實，便可知道戰由國民黨戰和由

國民黨和的一貫的事實和理論了。如前所說：國民黨是民族政黨，對外是爭取民族國家利益，對內是調和民族國家利益的，所以戰可以保全民族國家利益或必須戰來保全民族國家利益時，國民黨便挺身而戰，和可以保全民族國家或必須和來保全國家民族時，國民黨便挺身而和。國民黨只有因時間與外部內部條件的變化而易其政策，決未曾離民族國家利益的大旨，譬如共產黨則不然，抗戰起來，牠極力的要爭領導權，但實際不過盡搖旗吶喊之力，等到抗戰有了成果，需要用和來保障這成果的時候，牠仍在搖旗吶喊的要抗戰，因為本質上牠是一個外燶的東西，牠不代表民族國家的利益，民族國家殘破或衰亡了，牠仍然可以發展牠的蘇維埃，牠又何樂而出此呢？所以和戰之於共產黨，便不是民族國家的事情，而只是共產黨利用以發展其自身的工具了。

自然國民黨是有牠過去的錯誤的，我們站在黨的立場，虛心的承認，并力求改正，但國民黨是有牠過去的功勳的，廢除帝制，打倒袁世凱，并摧毀軍閥與封建勢力，這也需要黨外人士平心的承認，一個已經淪於次殖民地的國家民

族，整個的國家民族便是極其衰落的，在這個整個衰落的國家民族基礎之上所產生的黨，自然也不免要陷於微弱。客觀事實的需要，是要在微弱之中求強大，在衰落之中求復興，黨要如此，國家民族也要如此，黨與國家民族相互的目標，也要如此。這一點，我們誠心地盼望全國上下加以深省。

（轉載三民周刊）

以黨治國和以黨建國

劉重道

我國自從清末以來才有近代式的政黨，在歷史上東漢的黨錮，唐朝的牛李，宋朝的新舊黨，明朝的東林和魏黨都算不了真正的政黨，他們是少數人無組織的自由結合和歐美的政黨不同，歐美的政黨起源於議會中各利害相同階級之人民代表，他們大概都有一個明瞭具體而且較為永久的黨綱。他們的黨有各種組織。這不是私人意氣之爭，乃是政見相同的人們的團結奮鬥。中國歷史上之黨不是私人間的輕侮仇視頃軋，便是感情之人的結合，而非政策主張之不同。因此許多中國人觀念中的「黨」是一個壞的東西。他們認為黨是偏私，是結黨營私之「黨」所以說：「君子不黨」又說：「不偏不黨，王道蕩蕩」這樣一來中國人的政治生活祇是個人而無團體，國人之不能團結營共同的活動這也是一個要因。

中國國民黨推翻了帝制，打倒袁世凱和其他專制軍閥，統一了中國，統治了十幾年，固然有功有過，但在中國近代史上對於中國政治和一般社會文化之推進，中國國民黨不能不算作一個最大的力量，這是不能泯沒的事實。不過直到今日還有人在那裏疑惑「黨」是一個偏私的結合。譬如對目前的和平建國運動，有的人說和平建國爲什麼必要由國民黨領導呢？國民黨的主張有「以黨治國」和「以黨建國」，這是不是要黨人把持政治職位，或者是俄國式的一黨專政呢？我們在別的題目裏已經說過，「以黨治國」決不是「一黨專政」更不是以黨人治國，乃是以黨義治國，也就是用三民主義治中國。孫中山先生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要救中國必須實行三民主義，惟獨實現三民主義才可以救中國，所以主張以黨治國，這和黨人把持官位的意義迥不相牟。孫先生說：「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要黨員都作官然後中國方才可以治，是要本黨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

國，諸君要辦得清楚。」（十二年十月講黨員不可存心作官發財）這是說我們祇希望用三民主義救國，誰來實行却無限制。不但無限制，因為救國是偉大而艱苦的工作，更非全國人才悉數參加不可。所以他接着說：「倘若有一事件發生，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於本黨求不出相當的人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同上）況且國民黨的政治主張以全民政治為中心以民主政治為目的，這意義是主張全國民衆不分種族，宗教，階級，以及其他，都來參加政治，這如何能解作一黨專政呢？

以黨建國的意思是用黨的力量來建設國家。因為個人或幾個人的力量太薄弱了，黨是許多政見相同的人的團結，所以有力量。孫先生說：「其實現在我們何嘗有國，應該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後再去愛之。如今日上海廣州常見之青草地上起洋樓，必先經過一棚寮時代，此棚寮即用以儲置建築材料與工人聚居之所，由此乃可以建築洋樓。中國現有好多人不明革命黨之用意，即如羨慕洋樓者見棚寮而厭之，不知無此棚寮以儲工具材料等物，則所羨慕之洋樓只

是空中樓閣，永不能實現。故當洋樓未造成之前此棚寮實爲至可寶貴之物。革命黨之於國家即如棚寮之於洋樓。黨有力量可以建國，故大家應有此思想與力量，以黨建國。（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現時中國的政黨，從歷史的悠久，黨員的衆多，主義之深入人心，社會上各層級之支持等等，無論從那方面講都要推國民黨爲最有力。三民主義已滲透了全中華民族的心智，勢不可破，因此建國的重任非由國民黨領導不可。不過國民黨祇是個棚寮，單靠黨內的建築材料與工人是不夠的，所以主張團結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有志之士共同充任建國之材料與工人。這便是我們對前文中「爲什麼要由國民黨領導」的疑問之答復。到了憲政時期國民黨要還政於民，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在目前我們認爲建國必須和平所以一面由國民黨導領和平運動爲建國之先驅，一面由國民黨結束訓政，召開國民大會，推動政治走上民主立憲的光明途徑。

（轉載三民周刊）

中國國民黨的責任及前途

中華日報社評

中國國民黨統治了全中國一十三年之久，其成績祇有「喪師失地，民不聊生」。國民黨的黨員真是有何面目，以與全國人民相見！

然而環顧國內人民政治組織的能力，除了甘心亡國的共產黨之外，其餘各黨各派即使完全聯合，也尚無統治全中國的力量。就客觀事實而言，也祇有中國國民黨還有一個比較廣大而深長的基礎。

所以中國國民黨，雖然是罪孽深重，無地自容，但是對於目前挽救危局的責任，仍然是不容放棄的。

現在國民黨的黨員祇有勇於負責，痛改前非，然後方能自贖於國民。我以為國民黨的同志，應該深刻的認識下列二點：

第一，國民黨的黨員，必須堅守三民主義的遺教，將國民黨從共產黨的包

圍中拯救出來。同志中有甘心附和共黨，或僅知保全自己生命地位，而不惜以黨國爲犧牲的，必須以黨紀國法，加以嚴厲的制裁。然後舉全黨全國的力量，撲滅共產黨，并杜絕第三國際一切很毒的陰謀。

第二，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必須排萬難冒萬險，努力於中日的和平運動。但是和平運動，必須以革命的精神貫澈之。換言之，爲和平運動者，必須抱必死的決心，然後和平方能真正的實現。我們的認識，是日本決不願亡中國，不能亡中國，亦不敢亡中國。所以我們斷定，與日本言和，不是亡國；如果盲目的附和共產黨，聽憑第三國際的指導，而爲盲目的無期抗戰，乃真是亡國。所以我們與其抗戰而死，毋甯爲和平運動而死。其爲死一也，所不同的是國家的利害問題而已。

既然抱必死的決心而爲和平運動，所以我們的和平運動，是守着一種不屈不撓的態度。日本如果有誠意的，的確能夠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那末我們這些和平運動者。即使死於共產黨之手，死於蔣介石的特務之手，均所甘心。

的。如果日本是無誠意的，尙未覺悟的，不能尊重中國之獨立自由的，那末我們是根本認識錯誤，即使共產黨，蔣介石，日本人，都不殺我們，我們也應該自殺。這才是『國民黨的精神』。有此精神，才配得上作和平運動。否則，真是漢奸，真是傀儡，應該爲國人所共棄的。

這十數年來，『國民黨』三個字，留在國民的影像，並不良好。一般人民對於國民黨，只有厭惡痛恨及藐視，因之國民黨亦不能號召人民，國民黨如果仍對國事負責，非翻然改圖，與民更始不可。國民黨必須將過去一切的錯誤，糾正過來；將過去一切謬妄褊狹的態度，去除得乾淨；將過去一切政治上的罪惡，勇敢的自白出來；然後國民方能認識，今日的國民黨已非往日的國民黨，於是我們才有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否則，中國可以不亡國，國民黨非先行亡黨不可。

國民黨的決心與行動

中華日報社評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民衆之前指出和平已到了行動的階段，並且在全國民衆之前擔當起領導這個行動的責任。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且在全國民衆之前表示其純化黨的立場，強化黨的紀律，發展黨與民衆的關係的決心。

大會考察抗戰以來雙方的處境及外圍國際形勢的變化，發現中日戰爭現在已經到了結束的時機。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中國亦不能戰勝日本，這個事實作成了和平的可能，並且決定了和平的性質，即和平的誠意是雙方的，和平的條件不是亡國的。過此而不結束，戰爭在雙方都成爲無結果，無結果的戰爭延長一天，中國便一天耗損其復興的基礎，日本便一天不能確定其國際地位；而且在歐洲形勢的激變當中，今天或明天，東亞的慢性戰爭隨時有可能遭受第二次

世界戰爭的衝盪，而趨於總毀滅。

中國國民黨考察抗戰以來中日交涉的經過，發現交涉的爭點，已不在兩國的平等關係，而僅在蔣中正同志的個人地位。自德使調停失敗以至今日，蔣中正同志前後數次派遣代表與日本秘密談判的結果，關於共同防共，經濟提攜與善鄰友好三原則，雙方意見已無分歧，但日本堅持不以蔣爲議和對手，遂使談判擱淺。

大會認爲，中日戰爭既然到了結束的時機，即應結束戰爭；和平條件既然無損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獨立，即應實現和平。汪兆銘同志根據黨的立場根據中華民國的立場，在中日兩國人士之前及全世界人士之前嚴正解釋和平的三原則，確定其性質與範圍，以日本不自居於戰勝者的地位爲談判前提。對於汪兆銘同志的這個解釋，對方也已在中日兩國人士之前及全世界人士之前表示了他們的誠意。如此則談判和平的前提已經成立。大會並且認爲，黨要對國家負責，黨員要對黨負責。果能在無損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獨立之下獲得和平，國

民黨沒有阻礙這個和平的權利；果能在無損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獨立之下並且在無損國民黨政權之下獲得和平，黨員個人更沒有阻礙這個和平的權利。現在國民黨的努力已表現其非爲和平的阻礙，而爲和平的負責者，它便斷然起來領導；而黨員個人蔣中正同志的私圖却已表現其爲和平的阻礙，他便應當走開。

蔣中正同志個人的私圖使他失去了國民黨的支持，民衆的支持，這樣他就依賴共產黨，被共產黨所利用，轉來劫持國民黨，劫持民衆。因爲和平會影響他的個人地位，他就阻礙和平到底。對此，大會鄭重申明黨的立場，否認一月一日以後的中央措施爲合法，否認一月一日以後的中央的實際存在，並且遵照黨的紀律，將投降共產黨劫掠中央的蔣中正同志解除其總裁職權。大會重申以反共爲其基本政策，並且根據北伐以來國內外情勢的變化，修訂了黨的政綱。

大會根據以黨建國不是一黨專政的原則，並且遵循戰前已在開始進行的立憲程序，議決黨外人士有參加中政會組織的權利，並且議決從速召集國民代表大會，實施憲政，以對內爭取民主爲對外爭取解放的主體。大會對於汪兆銘同

志的以黨權扶植民權爲實現民主政治的手段，及其以和平收拾戰敗的局面，爲爭取民族解放的手段的主張，承認其爲準確，並且把黨的最高職權授予汪兆銘同志，責成其領導全黨，領導全國，以實現民主，實現和平。

本屆大會就是這樣子的在全體黨員在全國民衆之前表現了它的悲壯的嚴肅的決心與方針。我們想一想本屆大會的日期是在抗戰兩年國家民族瀕於淪亡的今天，本屆大會的召開是由黨員衝破藍衣黨及共產黨的箝制而自動提出的要求，本屆大會的地點是在淪陷的上海，真是感動極了，聽奮極了。現在國家民族雖已瀕於淪亡，但有了國民黨，有了本屆大會召開後的國民黨，復興國家民族的信心與辦法也就有了寄托，有了頭緒，有了負責者。這個意義真是十分重大。藍衣黨與共產黨雖然可以箝制國民黨黨員個人，但終於不能箝制國民黨黨員全體，現在國民黨重以昔年衝出袁世凱的紫禁城的勇氣，衝破了蔣介石的紫禁城，由最下層的發動召開了本屆大會。這個精神真是十分強毅。至于開會的地點，黨章本來規定要在首都南京，南京陷後，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只是遷地

辦公，首都仍然是南京。不過在此期間，黨政的活動中心事實上是不在南京了。去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武漢召開，不在首都召開的。本屆大會召開的地點也不在首都，而在上海，這一層，應當是沒有疑問。但因此我們想起辛亥革命前夕，黨的活動中心不在漢族的陷淪區滿清帝國之內，即在國外，二十八年以後的今天，黨的活動中心還是要在陷淪區，這真是感慨極了，但正因其如此，所以國民黨的歷史是十分悲壯的。國民黨的領導者汪先生及其同志，抗戰以來所受的遭遇，恰好象徵了整個國民黨的命運，本屆大會本其爲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否決了一月一日以來的重慶方面所加于汪先生及其同志的非法處分，這個，作成了真理的最後勝利。跟着這個勝利而來的，乃是和平運動成功的把握。我們可以十分恰當的說，在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意義上，本屆大會不但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偉大的一幕，而且也是國際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一幕！

辛亥革命精神與今日的和平救國運動

中華日報社評

何謂辛亥精神，是指辛亥以前，革命運動的特徵，亦即指造成辛亥建國偉業的精神。

何以特別提示辛亥革命精神，因其事績最艱難，價值最偉大，在一部國民黨史上，與國民運動史上，可稱黃金時代故。

予曾力斥中國民族已經衰老之說，予所持唯一強有力之論據，即爲有此辛亥革命運動故。以中國民族如曰在辛亥以前已經衰老乎？則不應產生此辛亥精神，蓋辛亥精神中，不獨表顯一部革命的仁人志士有少壯民族的特徵，且同時表顯全部國民羣起而共鳴於仁人志士，即不啻全部國民相率呈顯少壯民族的特徵也。如曰中國民族至辛亥而後始衰老乎？則綿延五千年的民族，不先不後，

恰於此二十餘年間，陡然衰老，論理萬說不通，是故因辛亥精神，可證明我中華民族絕未衰老。』

所謂辛亥精神，雖包括興中同盟兩時期，然發皇光大，從革命細流，蔚爲大海，尤推同盟會時期，故辛亥革命精神，改稱爲同盟會精神，亦無不可。

同盟會何以能將革命細流，蔚爲大海，雖曰直接間接與主觀客觀的時代因素，不一而足。然開宗明義，得力於距今三十三年前東京發刊的同盟會機關雜誌『民報』者尤大。

回憶此民報的創刊號，赫然宣布汪精衛先生的論文，題爲『民族的國家』大意憶爲國家的獨立與死亡，分界只在國家主權之是否操自本民族。如果擁有廣土衆民而所謂國家政權，操之他族，則其國不能不謂爲已亡。因此斷定當時的中國民族，已無自己的國家，已沈淪於亡國的地位。凡在中國國民應共同負起建國的責任，（作者手頭已無原文，然原文確實如此）。從此文發表後，多少富有愛國熱情的青年，於是相率加盟，同盟會遂日益廣大，（作者及若干友

好亦受此文感動而以堅定意志加入同盟會）。

國家不幸，從滿清手中，極力呼籲復國運動，並以頭顱生命實行復國運動的汪先生，乃於建國成功二十八年以後，重演其類似當年復國運動的悲壯劇，汪先生之不幸爲何如耶？中華民族之不幸爲何如耶？

然我人於此必須運用清澈的頭腦，樹立堅定的信心，以下正確的判斷者，即今日的和平救國運動，與三十餘年前的革命建國運動，心法相傳始終一貫，其形若異，其實實同是也。試述其要點如左：

一，辛亥精神爲深刻的內心覺悟，具有理智的根基，而今日和平救國運動亦然也。擁有四千餘年古國之光榮歷史，與夫四萬萬以上之人口，而國家主權，操自他族，試問除推倒舊有主權外，尚有何法，然推倒舊有主權，一至艱至難之事，以區區數千百青年奮然起而與根深蒂固已經三百年之清廷相抗，其成敗之數不待明言也。然當時同志，抱定一種復國信念，以爲就個人言，就團體言，就運動言，固有成敗之別，然就民族國家言，則祇有成功，絕無失敗。

因為民族的國家，本已淪亡，運動的失敗，祇是個人與團體的失敗，而革命運動萬一的成功，却是民族國家的成功。且個人與團體現在的失敗，即爲將來成功之初步，故當時革命運動，就正義言，固萬不能免，而就成敗言，亦祇有成功絕無失敗。不過當時革命運動的象徵，爲破壞性，爲反抗對象，爲轟轟烈烈，一若與今日的和平救國運動，不能相提並論。然今日日本對中國，固未以滿清自居，欲征服我而主宰我也。我中國之於日本，雖大部淪陷，亦未到亡國的境界。惟其日本不能亡我與不欲亡我，與我自身之未亡，故今日愛護國家的最大前提，即爲淪陷區域的如何收回，與夫未淪陷區的如何保安兩點，然如何貫澈此兩點，依據兩年來之教訓，所謂抗戰，非僅淪陷區的收回，毫無把握，即未淪陷區保安，亦絕無保證。事實上明明不能，而猶堅持抗戰到底論，是僅圖政府虛聲之成功，而絕未計及民族國家全體之成功也。換言之，亦即僅圖若干個人之成功，而絕未計及民族國家全體之成功也。更進一步言之，是將本可以不亡的民族國家，必欲以若干個人之故，強迫之至於全亡或半亡之境地也。是在

眞愛國志士所萬萬不能坐視者，於是和平運動的出現，和平運動者，實不過從未亡的民族國家中間，爭取其不亡，其真意義爲保存國家。惟其爲保國運動，故其本質爲建設性，爲協和對象，此與辛亥以前，從已亡的民族國家中間，爭取其復興，以爲恢復國家者，恰遙遙相對。尤有進者，辛亥革命志在建國，故在滿清一經讓國以後，即消滅其排滿運動，而建立五族共和的新精神，今日的和平運動志在保國，故在日本宣布尊重我自主獨立而後，即應收拾反日抗日情緒，而重建中日友好的新精神，昔由排滿而終至親滿，與今由抗日而至和日。其事尤遙遙相應。在愛國大前提下一切本理智以行，絲毫不涉情感，此其完全相同者一。

二，辛亥精神純爲大慈大悲之自我犧牲精神，絕無個人權利私心，而今之和平救國運動亦猶是也。憶同盟會創立之始，清廷雖受外力壓迫，然控制國內，游刃有餘。區區數千百無拳無勇之青年書生，以推倒清廷自任，其難可知，然當時同盟會會員，各抱亡國之痛，各存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一切均可

犧牲之決心，官府施以刀鋸斧鉞，而無所懼，社會詆爲亂黨叛徒而無所悔。生命毀譽且置不顧，所有功名利祿更視若無物，彼倅此起，赴義惟恐不先，此非辛亥以前同盟會員之精神乎，以此種精神，較之今日和平運動，形式上又一若前何勇而今何怯者，然從建國的實質以言，今日之和平運動，與政府之虛偽宣傳相抗，與社會之浮誇客氣相抗，既已橫遭侮蔑，且復身攖暗殺，然主張和平者，不忍斯民之水深火熱，不忍古國之竟爾淪胥，抱持惟和平談判，方可救民保國之一信念，一反投機者盲目者之隨聲附和，而毅然行其心之所安，置生命與毀譽以及自身權位於度外，試問與辛亥精神中之自我犧牲一特徵？有何相異，此其完全相同者二。

此外同盟會同志，絕不仗虛聲附和之力，而往往出之以特立獨行之自我犧牲精神，今之和平運動者亦然。同盟會同志，內雖滿載沈潛的毅力，而外表絕不流露英雄好漢氣概，今之和平運動者亦然。同盟會同志，其志懷抱雖可驚天地泣鬼神，而行動常降志辱身，今之和平運動者亦然。嗚呼！誰謂和平運動之

精神，非辛亥精神的遺留與復活乎？

同盟會同志，能表顯其特殊精神，卒能感格全國，我人深切期望今之贊同汪先生和平救國主張者，均能鑒於此次運動較之辛亥以前革命建國工作，更艱更鉅，而能表現一種更特殊更偉大的精神，以感召國人。同時並深切期望國人認識辛亥精神者，均能認識和平救國精神，而出以更同情更負責的態度，以共濟空前未有的難關，則已經殘破之國家庶幾有救。

救黨救國應有的認識

中華日報社評

國民黨自從民國十六年，完成統一以後，直到於今廿八年，可算秉政十二年。這十二年間的政績，固然已經有口皆碑，無庸贅述，就是黨員中明白的人，也無不大家願意坦白的自承已往，追取未來。

至於非黨員的大多數國民，除掉根本不問政治與那些只顧到當前事實，替個人打算的不計外，可是有些高瞻遠矚的人。因為十二年來政治的不能滿意，就不免發出反對的呼聲，更因為目前是「以黨建國」的時代。所以更對黨表示不滿，消極的來一箇不合作，積極的更進一步預備另有組織，來爭取政權。

國家政治，因為政府的失職，以政黨與非黨之間，來了一箇很大的鴻溝。這是十年來無可諱言的現象，可是在黨的方面說起來，明白的黨員，也跟黨外的人民，同樣痛恨政府的失職。並且更比黨外的人民，進一步恨那負責當局，

挾了行政的勢力，去壓迫黨，去侵犯黨，本來是以黨建國，黨權高於一切，那知結果適得其反。邵變了以黨殉政，領袖高於一切了！

自從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閩天響的大炮，固然摧毀了國家無量數的物質，邵也同時打平了這黨與非黨之間的這條鴻溝。全國有智識的人民，大家都認為：

一、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應該在國家的立場上做工作，消極的不該再獨善其身，積極的更應該努力奮發！

二、看透了獨夫把持政治，以黨殉政。因此這十二年來的不滿人意，只能歸罪於獨夫及其所把持的政府，而不能歸罪於黨。

三、非黨員不必自認爲『化外之身』。儘可與黨員合力工作，尤其黨也是以民主政治爲最後歸宿的。

四、明白的黨員，已經提倡民主政治，並且具體說明以國民黨爲核心，連合全國各黨各派，同盡救國之責，所以此時更不必再問有無黨籍。

在這四種認識之下：所以黨與非黨之間，早已無所謂畛域，無所謂疆界，只可惜大家悔之已晚。兩年來共產黨早已著我先鞭，更深深的挾持了獨夫領袖。造成以全國殉黨，以黨殉政，以政殉獨夫，以獨夫殉共產黨的局面。

抗戰兩年，失地萬里，國家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階段。黨也除掉招牌以外，更是奄奄沒有生氣。所幸汪先生出而主持正義，提倡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纔算開了一條救國即所以救黨，救黨即所以救國的途徑，於是無論黨員非黨員，更多了些認識：

一、黨員知道黨已經受了共產黨的毒化。獨夫的把持，亟應設法救黨，由救黨中負起救國的責任。

二、黨員知道現在重慶的黨權，已經成了共產黨借屍還魂的屍，而不是原來的國民黨，亟應設法救黨。

三、非黨員知道黨中已有明白先覺的人，肯出來主張正義，或者更進一步

的主持大計，實行救黨即是救國的初步。

四、非黨員知道主張救黨救國的汪先生，即是提倡民主政治最力的人。

五、非黨員知道在現階段上，還是以黨建國，救國之事，刻不容緩，自應責成黨來負起救國的責任。

在這各種認識之下：無論黨員非黨員，竟然完全同意在一條共同的道路上救國，毫無疑義，並且更有一最重要的認識：就是日本與我打仗，將我由黨產生的國民政府，打出了首都南京。如今既然我要以獨立自主的政權，來行使和平交涉的方案。必先要有了政府，方纔有推進和平的機構。可是既然要有獨立自主的政府，按照法統黨章說起來，當然是應該仍舊由黨產生的國民政府，來負這箇責任。其他組織，無論志願是否在減少人民的痛苦，或是迎合環境上的需要，或是爲主張和平的根基。但是在法統上，在黨章上，同時尤其在國際上，是說不過去的，是不能存在的。

全國人民，既經獲得了這些認識。在這緊要的關頭，就應該放手讓黨員做去，而黨員更應該趕緊實行自謀救黨的方法，分開責任來說：黨員救黨，先要

從基本工作上去做，然後再從重慶共產黨的手中，奪回那些被挾持的黨部，一俟到了可以黨建國的階段，就立即延攬全國各黨各派，各智識份子，共同努力於恢復國民政府的工作，等到政府恢復，確立了獨立自主的一貫政權，自然和平大業，容易推進，民主政治可期實現了。

敬以萬分的誠意，希望全國人民，共同努力，更希望全黨黨員，立時出動，須知一箇病在垂危的中華民國，已經不起任何名醫的『姍姍來遲』了。

當前的急務復興中國國民黨

中華日報社評

和平是有遠大目的的，轉變數十年來中日兩大民族相侮相仇的心理，成爲共存共榮長治久安的局面。中國於和平之後，可以走上建設現代國家的坦途，日本於和平之後，可以協同中國維持東亞和平。和平不是最終的目的，在我們說，和平是達到建設新中國，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手段。由和平到建國，工作繁重，經緯萬端，須有堅強勇毅的工作者或幹部，始能担负，實現這種艱巨的任務。在現代的中國，這個工作者或幹部，無疑的就是奉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

但是現在的中國國民黨，在獨裁者的強力控制下，在腐化惡化份子的侵蝕刦持中，已不能負担上述的偉大任務。所以我們想實現和平，必須先復興中國國民黨：想建設新中國，更須先復興中國國民黨。復興國民黨的工作做不到，

和平固屬無望，建國更是空想。

有些人看到國民黨某些不可避免的錯過，國民黨內某些份子的罪惡，就發爲『毀黨』、『滅黨』的呼號，這是未認識現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更忽視了中國國民黨在現社會中所負的歷史使命。不說現代的中國便罷，提起現代的中國，就脫離不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產婆與保姆，中國的近代史就是國民黨的活動紀錄。國民黨既往的光榮史跡，如推翻專制，建立民國，護法討袁，北伐統一等，不必細講，近十年來中國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已漸備現代國家的雛型，而一般建設的突飛猛進，更築成繼往開來的基礎，要不是獨裁者受制於惡化份子，輕啓中日釁端，中國或可日臻於富強之域，成爲安定東亞，保障世界和平的一支主力。更重要者是三民主義的信仰深入人心，牢不可拔，形成凝固的立國精神。這是國家起死回生的良藥，不是任何人爲之力可以倖致，亦不是任何人爲之力可以摧毀的。清末以來中國的擾攘紊亂，受人侵凌，肇因於固有的立國精神已經渙散，新的立國精神尚未確立。北伐以來，中

國最大的成就，是三民主義由於萬衆的信仰與擁護，形成爲舉國信奉的立國精神。自由主義者對於三民主義，信奉遵守，已是衆所週知之事，卽窮凶極惡的共產黨亦以宣稱信奉三民主義爲其存在的護符。這種精神是國民黨幾十年來的壯烈犧牲，勇往邁進養成的，亦是國民黨的主義，適合國家需要，應乎民衆要求促成的，凡是愛護中國者，均應當發揚之，光大之，使成爲建國的動力。有些人不此之圖，反而高調『滅黨』，『毀黨』，『剷除三民主義』，不僅不會有絲毫成就，反是徒滋紛擾，阻礙國家的進步，未免太違反現實了。事實上以滿清的壓迫，北洋軍閥的摧殘，共產黨的惡毒，帝國主義者的砲火，都不能阻止國民黨的發榮滋長。時至今日，國民黨在民衆間的基礎已經穩定，三民主義已成爲萬衆奉行的立國精神，更不是少數人所能毀滅，所能撼動的。

『毀黨』『滅黨』固不是辦法，任國民黨在強力的統治下，受腐惡份子的侵蝕以終，也不是辦法。要是如此，我們不僅無以對總理，對民衆，更無由勵行『和平』『建國』的大業，挽回中日兩大民族的劫運。因此，當前的急務是

復興中國國民黨，復興有光榮歷史的革命的中國國民黨，然後才可以進而圖謀和平，建設國家，以實現國民黨所負的歷史使命。

現在幸而有國民黨的真正領袖，力排萬難，主持和平建國的工作，凡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凡是愛護國家的民衆，都應當懇請，都應當追隨，汪先生及其忠實幹部，先做當前的急務——復興中國國民黨。

發動護黨運動

中華日報社評

重慶政府已經不是國民黨的政權，而是藍衣黨與共產黨的政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當中，民族主義是要完成中華民族之獨立生存，藍衣黨與共產黨却要我們依賴英國，亡給蘇聯。民權主義是要領導人民的政治運動，藍衣黨與共產黨幹的却是統制人民的政治運動。民生主義是要人民都有工作，都有飯吃，藍衣黨與共產黨却在以焦土政策毀滅人民的生計，把人民趕去做土匪。

誰個敗壞了國家大事呢？是藍衣黨與共產黨。國民黨則和人民一同，成了藍衣黨與共產黨統治下的被壓迫者。國民黨要在人民的面前辨明這個責任。

藍衣黨與共產黨終究是不能代替國民黨的，在歷史的試驗之下，重慶政府的覆滅已成爲不可避免的了。它所依賴的國際主人救不了它，它所利用的國內軍人已在開始分裂；它所放縱的土匪毀滅着一切，必然要把重慶政府也毀滅在

裏頭；而它所蔑視的民衆則已經在離開。藍衣黨與共產黨的命運是無可挽救的，但我們不要讓國民黨與國家民族成了藍衣黨與共產黨的殉葬者。國民黨必須從重慶政府脫離出來，並且幫助民衆脫離重慶政府，從地下拾起藍衣黨與共產黨手裏掉下來的民族革命的旗幟。

重慶政府之走向覆滅，只有更加提高國民黨員以黨建國的信心。但國民黨要是偽處在重慶政府的箝制下，它便沒有可能行使權力；國民黨要是被關在重慶政府的圈子裏，它只有與淪陷區的民衆隔絕，沒有可能統一領導人民的救國運動。然而國民黨是不可能被禁錮的。過去它曾經衝出袁世凱的紫禁城，現在它要衝出蔣介石的紫禁城。它要走到民衆的地方去，走到救國運動的中心去，它要實現民衆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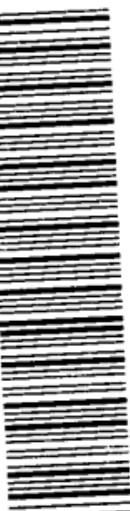
民衆現在要求的是和平。只有和平，纔能糾正外來的日本的侵略，纔能結束國內的軍事獨裁與軍事破壞。只有和平，纔能挽救民族的危機，恢復人民的政治地位與人民的生計，並且加以提高。人民的這個要求，也就是國民黨所要

求的復興民族，發揚民權，建設民生。國民黨的責任，就是要領導和平運動，把黨的要求與人民的要求打成一片。

現在，前方後方以及淪陷區的民衆都在急迫的期待國民黨，呼喚國民黨。應着這種期待與呼喚，國民黨必須即刻有行動的表現，爲了工作的方便，爲了保持與民衆的聯繫，國民黨應當即刻走出重慶政府的圈子。辛亥革命前夕黨的活動中心是在海外，洪憲時代黨的活動中心是在廣東。現在呢，黨只有在重慶政府的圈子外去建立它的統一的活動中心，再造以黨建國的基礎。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5 5857B





一月出版